

Urban History Research

第28辑

城市史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史研究：第2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80688-860-5

I. ①城… II. ①天…②天… III. ①城市史-文集
IV. ①C912. 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4765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 址：www.tass-tj.org.cn

印刷：河北省廊坊市博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28輯

Urban History Research

城市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编委会

顾 问 李锦坤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新平 李家祥 张 健

张利民 周俊旗 靳润成

本期主编 张利民

副 主 编 任云兰 任吉东

编 辑 张 博 万鲁建 许哲娜

熊亚平 王 静 成淑君

目 录

市镇发展

- 高 鹏 “惟有双河犹带绕 秋风禾黍忆苍凉”
——由“小天津”临清的没落思考城市盛衰转化的内部机制
..... (1)
- 熊亚平 任金帅 略论近代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之间交通
方式的演变(1860~1937) (17)

区域经济

- 冯 剑 艰难的转变:近代天津民间合伙债务问题初探..... (30)
- 张 博 自然环境与农产品流通:以晚清营口豆货贸易为例..... (45)

社会文化

- 柳 敏 近代青岛平民住房建设与移民的社会融入 (57)
- 付燕鸿 近代城市贫民阶层的形成与时代特征
——以近代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71)
- 王 静 近代城市发展中的族群认同与排斥
——以天津“僮”字风波为例 (85)

研究综述

- 王肇磊 任吉东 承继与开拓:“20 世纪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97)

2 城市史研究

- 熊亚平 “近代中国北方经济地理格局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 (106)
- 丁 芮 城市史研究发展的新动向
——第十四届中国社会史年会综述..... (112)
- 王 静 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118)
- 张利民 “长芦盐业历史文化研讨会”会议综述..... (124)
- 陆 烨 “外国文献中的中国城市”学术研讨会综述..... (130)

国外研究

- 成淑君 妓女、城市发展与现代性
——评《20 世纪初苏州娼妓业的地位》..... (137)
- 林涛著 喻满意 许哲娜译 逃离烽火:抗日战争期间的政府、
城市、同乡会和难民 (143)
- 熊远报著 周志国、成淑君译 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的卖水业与
“水道路”..... (164)
- 小林元裕著 万鲁建译 天津事件再考
——以天津总领事馆、中国驻屯军、日本侨民为视角
..... (192)
- 贺萧著 任吉东译 近代天津城市的塑形..... (217)

“惟有双河犹带绕 秋风禾黍忆苍凉”^①

——由“小天津”临清的没落思考城市盛衰转化的内部机制

高 鹏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作为北方传统城市的典型——“小天津”临清作为对象，对造成城市衰落的内因及它们之间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传统社会中，建立城市要先考虑其在政治、军事上的控制功能。“行政框架”为城市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它为每个同级别的城市都提供了一个大致相当的发展基础。但是，即便发展基础（或行政框架）相当的城市，其“冲、繁、疲、要”程度也不完全相同，发展际遇与发展程度也不会完全相同，这些就是促进一个城市发展的加权因素。随着城市加权因素（以经济因素为主）的发展，统治者会相应上调城市的行政级别。新的“行政框架”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资源。反之，城市衰落首先表现为促成城市发展各种加权因素不断剥落。行政框架是抵制城市持续衰

^① 民国《临清县志》，“漳河怀古”，第1536页。

落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行政框架存在,城市的衰落就是有底线的。

关键词: 临清 行政框架 加权因素 城市衰落底线

Exploring the Transforming Mechanism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City with the Decline of “Small Tianjin” as Case

Gao Pe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interior causes for the decline and their interior working mechanism of city, with Linqing, the “small Tianjin”, a typical traditional city in north China as an objec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control function in military and politic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while establishing a city. Executive framework, which provided the first and primary consumer for the city, also provided the cities of same level with a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base. However, even the city of same development base or executive framework,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chong, fan, pi, yao”, and hence differe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degree, these were the weighted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ighted factors of a city, the ruler would enhance its executive level. New “executive framework” provides the city with new base and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Conversely, the decline of city first displayed the decay of various weighted factors. “Executive framework” was the last defense line to resist city decay. As long as the executive framework existed, the city had the bottom line to defend the decay.

Key words: Linqing, executive framework, weighted fac-

tors, bottom line of city decline.

衰落城市研究是一个较新的课题,“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关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研究也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先后取得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某些研究已具有突破性进展。”^①相关研究成果,蔡云辉在《近十年来关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综述》一文中做过详细介绍,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学界多将“衰落城市”研究置于城市史研究的大框架之中。如戴钧良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傅崇兰著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等著作都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的论述过“衰落城市”这一问题。还有一些城市个案研究和专题论文也涉及这个问题,将“衰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课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近年来,《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和《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等著作的面世,标志着学界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② 学界研究已达到相当高度,但仍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还有很多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一则,造成城市衰落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如果因素非止一种,它们之间又是如何共同发生作用的,这仍是困扰本课题的根本问题;二则,选取典型案例(尤其是北方城市)对造成城市衰落的内因的研究尚显薄弱。笔者试图从“小天津”临清的盛衰转化中寻找造成我国城市衰落的内因。

① 蔡云辉:《近十年来关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130~137 页。

② 何一民主编的《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一书,对城市政治功能的变化、城市经济因素的变化、战争破坏和外部掠夺、交通路线改变和地理优势丧失以及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等造成城市衰落的五个主要原因,结合相关城市实例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该著作使得我国近代衰落城市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更进一步。蔡云辉的《战争与近代衰落城市研究》则针对造成城市衰落的战争因素进行了深度分析,并阐释了有关“衰落城市”,以及“长期衰落”和“阶段性衰落”等基础概念与相互关系等。

一、“小天津”的由来

临清位于山东省西北部,漳卫河与古运河交汇处,与河北省隔河相望,是连接晋冀鲁的重要门户。如今的临清市作为县级市,早已湮没在全国两千余座县城,历史上的临清却是有名的大都会。“小天津”的别号就是其曾经繁华的重要见证,至今仍有很多临清人亲切的称其为“小天津”。笔者查阅了很多材料,未找到临清“小天津”之称的来源。笔者在网上发现这样一则说法,权列于此。“据传说‘小天津’之称,始于乾隆之口。原因是临清商号多以天津供货商店的字号而命名,有的就是天津大字号的分号,所以有不少商号与天津大字号重名。同时常住临清的天津客商也很多,食品行业为招徕顾客,使饭菜尽量符合天津客人的口味。乾隆到临清后,看到河船码头、市容风貌颇似天津,吃的食品多是天津风味,所以称临清为‘小天津’。”^①

传说只是传说,“小天津”别号之形成尚需具体考证。一则,虽然在乾隆三十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四十一年,“皇上(乾隆)东巡、南巡回銮时阅视运河,必经临清,且为驻蹕所,”^②其四次驻蹕临清,留下了御制诗八首,均无乾隆帝称临清为“小天津”的记载。二则,如今的“小天津”,历史上曾是叱咤风云的大都会,临清的兴起和繁荣要远远早于天津。早在明初的1489年,临清就已由县升州,“明洪武辛丑,改东昌路为府,隶山东布政使司,临清县为东昌之属。弘治二年,升州,领县二,馆陶、邱县。”^③《明实录》的记载更为详细,“弘治二年正月,丙戌,升山东临清县为临清州,以馆陶县及丘县隶之,仍属东昌府,从巡抚都御史钱钺奏也。”^④明末清初之际,临清已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大都会。据明万历三十七年编撰的《歙志》列出了当时的“大都会”云:“今之所谓都

① 《临清发展史料》,来源网址:<http://hi.baidu.com/462514925/blog>。

② 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张度序”。

③ 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卷一,建置沿革”。

④ 《明实录·孝宗实录》,弘治二年。

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① 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大都会”的地位仍相当牢固。临清“河运直抵京师，水陆交冲，畿南一大都会也”，“甲第连云，人物熙攘，漕运万艘扣尾北上，市肆毂击肩摩不灭，临淄、即墨亦叹盛哉！”^②而天津城的创建要远远晚于临清，“永乐二年，筑城置戍，三年，更名天津卫”，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改卫为州”，^③也就是在临清升州二百余年后，天津才实现改卫为州。与明代相比，康乾时期的临清虽已放缓了发展步伐，但总体上仍处于上升期。“乾隆四十一年，皇上用大臣议，进临清为直隶州，而属以武城、夏津、邱县，体崇事殊，非复属东昌时比”。^④当时的天津城市发展虽“峥嵘初露”，由卫改州后不久，即在雍正“九年改设天津府，”^⑤但这一时期的临清尚不需要借“小天津”之号名之。所谓“小天津”的别号应出现在近代以来，临清没落与天津崛起的过程中。临清的城市黄金期处于明中期至清初，而天津的城市黄金期发轫于清中叶，极盛于近现代。“小天津”这一别号使得相距甚远的两座城市之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小天津”的兴衰转化

一个城市既然基于某种原因、际遇而兴盛，也就往往会因该因素和际遇的丧失而走向衰落。讨论城市为何衰落，首先要考虑城市因何兴起。前文我们提到，临清与天津两座城市的繁荣时期并不处于同一个时代，但两座城市兴起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共同点。可能正是这些共同点造就了“大小天津”之缘。关于天津的研究成果非常多，笔者在本文中着重考证临清相关情况。

① 万历十七年《歙志》“卷十·货殖”。

② 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贺王昌序”。

③ 宋蕴璞辑：《天津志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页。

④ 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张度序”。

⑤ 宋蕴璞辑：《天津志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9页。

1. 政治、军事之需——建城的最初目的

无论是临清还是天津,最初的设立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在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建立临清城首先考虑的是其在政治、军事上的控制功能。临清地处数省交汇处,政治、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清源,东郡名区。西北控燕赵,东接齐鲁,南界魏博,河运直抵京师,水陆交冲”,^①“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南北之咽喉,近畿之锁钥也”,“州地于古当中原之都会。明兴,肇建两京,而吭掇(同‘扼’)辐辏于其中。昔人谓‘鏊天中区,控地四鄙,咽喉九州,閭域函夏’”。^②《临清建城记》记载最为详细:“临清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在东昌郡之北,为其属邑。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为要且切也。如此而可以无城池、兵戎保障乎?朝廷深以为念,乃简阅于帅臣廉干者得平江侯陈公,遂命往镇临清,而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公曰良,同理其事。”^③从这篇行文中,我们无法断定临清建城的主因是政治、军事因素,还是经济因素。

其实,笔者通过对其他资料的查考,发现促成临清建城的主因还是政治因素(主要是军事因素)。因为战略位置重要,临清多次卷入战事。临清建城是在非常迫切的军事压力下完成的。笔者择取《临清直隶州志》中关于临清建城前后的有关战事记载摘录于下:

正统末,福建河县贼起,陈豫以副总兵从宁阳侯陈懋分道讨平之,进封侯。也先入犯,出镇临清,建城堡,练兵抚民,安静不扰。^④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丁丑朔,徙山东济宁左卫于临清,改为临清卫,以临清守御千户所隶之。^⑤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八月,上北狩,众多议和。于谦曰:

① 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贺王昌序”。

② 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旧序·十三”。

③ 民国《临清县志》,“临清建城记”。

④ 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兵防、武备事迹考”。

⑤ 《明实录·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

社稷为重，君为轻。遣人申戒各将，分守宣府、大同、天寿、昌平，命平江伯陈豫守临清。^①

景泰元年(1450年)，有戎马之警，陈豫以兵寡请于朝，调济宁左卫守临清。^②

所谓“上北狩”、“戎马之警”等皆为掩饰之语，正统十四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土木堡之变”。明政府与瓦剌发生军事摩擦，明英宗御驾亲征，但不久便全军溃败，英宗被瓦剌生俘。是年，代宗朱祁钰即位，遥遵明英宗为太上皇，第二年改元景泰。这场战事直接促成了临清城的修建。

我们再来看一下明代宗要求速修临清城的敕令：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甲午，敕平江侯陈豫、副都御史孙曰良、洪英、巡按山东御史及山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临清系南北水陆要冲，仓粮动经数十余万，加以四方供输、军民漕运、商旅买卖、公私货物并在道路，其数不可胜计。非有城池可恃，倘遇有警，将何所守？敕至尔英等并三司堂上正官，即亲诣临清，会同尔豫等，趁此虏寇声息稍缓之时，量起倩居民人等筑城，以安军民，以护粮储，以守闸坝。物料，或官为措办，或自行设法。当于何时起工，计至何时可完，毋分昼夜，作急整理。不许似前迁延怠忽，致误事机。如或未能筑城，别有长策可以保护，亦须明白开奏，不许视为泛常，互相推调。尤须抚谕所在军民，不许虚相传报声息，辄自迁徙，因而抛荒家业，自貽后悔尔。其钦承朕命。毋怠毋忽。^③

这份要求“趁虏寇声息稍缓之时”速建临清城的敕令，完全不似《临清建城记》中记载的那般“气定神闲”。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修建临清城主要出于政治、军事考虑的结论。并且，临清和天津一样，都有设卫的经历。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己未，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

① 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兵防、武备事迹考”。

② 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兵防、武备事迹考”，出自《东昌志》。

③ 《明实录·英宗实录》，景泰元年，（景泰朝附入《英宗实录》）。

屯守。”^①正统十四年(1449年)“丁丑朔,徙山东济宁左卫于临清,改为临清卫,以临清守御千户所隶之。”^②这应该是“大小天津”结缘之始了。

其实,不仅“大小天津”,我国城市兴起时期的政治、军事色彩远较西方浓厚是不争的事实。以都城为例,《吕氏春秋》提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则宫之中而立庙”。^③“中国历史上的国都都有它的特殊性,它首先是政治中心,在政治中心的基础上成为消费中心……在中国的都城,经济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政权,从属于皇帝”。^④政治、军事因素显然是历朝历代建都首先考虑的因素。不独是都城,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城池,基本上都是和政治上的等级制度相适应。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规模与“城主”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据《左传》的记载,“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子男三仞。”^⑤汉代的城市,“一般来说,普通县城的城郭周长为1000~3000米;郡治所在的县城规模要稍大一些,3000~5000米。”^⑥秦始皇“徙天下富户十二万户居咸阳”^⑦的行为,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我国古代城市并非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据有关学者的实地测绘,清代的城市也具有同样的特点。“首府城市的城内面积与行政层级之间的关系下伸到了府、县两级。在11个省的每一个省中,抽测的府城平均面积显然比县城平均面积要大。”^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有学者对宋、辽、金时期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此相似。^⑨早期的城市多建在水陆交通要道,这是城市经济发展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另外,

① 《明实录·成祖实录》,永乐二年。

② 《明实录·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

③ 《吕氏春秋·慎势》。

④ 倪建中主编:《首都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⑤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⑥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⑧ 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104页。

⑨ 详见成一农:《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5月。

大小城市中按建制配备的公务人员和驻军是城市中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同时他们还是市场的保护者。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封建社会中,每个同级别的城市(县城与县城、府城与府城、省城与省城)都具有一个大致相当的发展基础(或曰行政框架)。

2. 加权因素带动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的后续动力

如果说,建城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那么经济无疑是推动城市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后续动力。即便发展基础(或行政框架)相当的城市,其“冲、繁、疲、要”程度也不会完全相同,发展际遇与发展程度便不会完全相同,这些就是促进一个城市发展的加权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城市历数千年而没有什么变化,县城依然是县城,如山东茌平;有的城市由县而州,由州而直隶州,如山东临清;有的城市由卫而州、由州而府、由府而省城,如天津。

在大致相当的行政框架之上,临清与一般县城相比具有以下优势(或加权因素),使其获得了比其他县城更多的发展际遇。首先,其地理位置远较一般的县重要得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做了不少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其次,运河的开通与钞关的设立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地。明“永乐迁都北京,需要南粮北运以满足京都和北方的需求。永乐九年春,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同时,还疏理了御河,开通会通南河,自此大运河全线开通。临清处于汶卫交汇口,可以‘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它为其成‘舟车络绎,商旅辐辏’商业重地提供了充分条件。”^①虽然,运河的开通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但是不可否认,也方便了南方商人和商品由此通往京都,促进了临清经济的繁荣。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正月,临清等地的繁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往来之所聚。今建都北京,而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闸,一年以为定额,庶无侵欺之弊。’”^②可以

① 黑广菊:《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52~58页。

② 《明实录·成祖实录》,永乐二十一年。

说,运河的开通为临清的繁荣创造了更好的机遇,这也属政治因素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的典型事例。三者,临清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历来官署众多。“由永乐以迨我朝,临清置三仓,岁收山东河南之粟,以节漕力,户部官属漍(同莅)之。国家凡有营建,恒需砖,临清因帆樯之集,而以砖附之。设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于其地,督征砖价,分窑成造,输之京师。宣德十年,置清源关榷税,以御史领之;弘治初,户部岁出主事一人。景泰以来,屡以文武重臣奉敕临漍(同莅)。天顺间,以中官为镇守、为督饷,更代数十年不绝备兵。则有东昌道,武有总戎,设左右中前四营,游守各四□额,兵四千人。”^①官吏与兵员众多,为临清城提供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消费群体,这些都刺激了临清经济的发展。

种种加权因素带动了临清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繁荣。至明后期,临清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大都市。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曾做《鳌头矶》一诗,“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②清代临清知州贺王昌作《题清源》诗四首,其中有“名区东郡首清源,水陆交冲市井喧,翠羽明珠多大贾,奇花怪石有名园”;以及“舟车辐辏说新城,古号繁华压两京”,“千帆寒影落平沙,烟火沿堤几万家。”等诗句^③这些都是对临清城市繁荣景象宏观的描绘。

还有几个量化的数据可以作为临清城市发展繁荣的佐证。万历年间,临清关税额一度达到 117861 两,名居运河七大钞关之首,占钞关总税额的四分之一强。城市商业的繁荣“引发城镇人口数量与结构、街市以及城镇规模等空间布局的变化。”^④据统计,万历年间,临清州(不包括领县)有户口 3 万余户,人口约 6 万 6 千余人。^⑤嘉靖“二十一年,巡抚都御史曾铣、兵备副使王杨得邱文、庄濬书协群议。始于旧城乾位至

① 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王俊序”。

② 民国《临清县志》,“艺文·诗词”第 1499 页。

③ 民国《临清县志》,“艺文·诗词”第 1525 页。

④ 黑广菊:《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52—58 页。

⑤ 万历《东昌府志》“卷十二·赋役”。